

压力还是保障:社保负担影响主观福利的传导机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黄毅¹

广东培正学院 广东 广州 510830

摘要: 社会保障既为就业者带来长远的预期保障,也对其短期生活水平造成挤压。本文引入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的新概念,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其对就业者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具有双重性:由于对短期生活水平的挤压,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不利于生活满意度的实现;另一方面,由于社保的保障性质,工作满意度和抑郁心理在关系中存在链式多重中介效应。这为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识别并利用好这种双重影响,特别是对于负担重、保障收益低的灵活就业群体。研究建议,应推动社保减负降费,扩大参保基数、减少断缴,做好社保资金开源节流和全国统筹,加强就业质量保障和心理健康建设。

关键词: 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 工作满意度; 抑郁心理; 生活满意度

一、问题提出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20年我国就业人口超过7.5亿人,占总人口数53%以上²,毫无疑问,就业人群的心理健康和幸福即是大多数人民的共同福祉。在全球经济萎缩,我国老龄化不断深入和经济增速下行的背景下,就业人群的工作、发展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对其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形成挑战。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调查对象中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抑郁高风险检出率分别达到14%和16.5%,不同地区、学历的人口均均有12.4%—20.6%的抑郁高风险检出率,18—45岁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45岁以上年龄段,抑郁水平随年龄增加而降低³。这意味着大部分适龄劳动人口及其大部分职业生涯都面临着比其他人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

作为就业者的权益保障,社会保障属于广义工资的一部分,却对于就业者可支配收入存在挤出效应。在高缴费负担下,就业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降低,与此同时,企业也可能将部分缴费压力转嫁给就业者。社会保障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长期相对较重。根据发改委数据,中国企业职工五项社会保险总费率曾为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39.25%,在列入统计的173个国家地区中列第13位,接近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福利国家40%的缴费门槛,分别比美国、日本和韩国社保缴费率高出23.2、14.01和24.12个百分点,约为菲律宾的3.04倍,泰国的3.84倍和墨西哥的4.76倍(关博,2016)。同时,中国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在全球范围内也较高,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国社会保险费占商业利润比重高达46.2%,在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二⁴。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个人社保负担对就业者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以期对就业者社会保障政策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二、研究回顾

有关社会保障主观福利效果的研究,学者们的侧重点和结论存在差异。多数学者认为社

¹ 作者简介:黄毅,广东培正学院行政管理系专任教师,研究方向:社会治理。

² 国家统计局(2020)。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本文关于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基金收支的统计数据皆源于此。

³ 傅小兰、张侃、陈雪峰、陈祉妍(2021)。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⁴ World Bank.(2020). Doing Business 2020: Comparing Business Regulation in 190 Economies.

会保障会显著促进享有者的主观福利。Ralston等(2019)认为养老金收入对弱势老年人主观福利有正向影响。王震和刘天琦(2021)认为,新农保政策明显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和生活满意度有积极作用。在对心理健康与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方面,李超和郝希(2017)的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侧重的种类不同,无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农民工都非常重视社会保障状况,社会保障状况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关晶等(2020)认为,社会保障参保行为和深度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和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工作满意度。许多学者发现,社会保障还能够显著降低抑郁程度(李亚青,王子龙,向彦霖,2022;何泱泱,周钦,2016)。

但也有学者发现,社会保障对于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存在负面影响。通过对CGSS两期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实证分析,褚雷和邢占军(2020)发现,2012年基本医疗保险能够提高居民幸福感,而2017年对城镇居民则没有这种影响。岳经纶和尤泽锋(2018)发现,养老保险待遇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中低收入阶层更关注缴费对生活工资水平造成的挤压影响,养老保险缴费对其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李越和崔红志(2014)发现,新农保制度对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作用并不明显。

现有研究更多从参保状况和领取收益的角度出发,鲜以参与过程中的缴费负担为研究对象,此外,也较少将“五险一金”作为整体考虑(褚雷,邢占军,2020)。这说明,现有研究常忽视社会保障影响的双重性:既具备保障功能,又对短期收入存在挤压。因此,本研究将从个人缴费负担的角度出发,解构社会保障的双重影响,探究其对就业者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进而探讨当前应如何“扬长避短”,更好地增进就业者福利。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样本构成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微观入户调查数据中的家庭问卷和成人问卷。根据研究需要,将分析对象限定为接受调查时有主要工作,从事各种工作形式的就业者(包括自家农业生产经营、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他自雇、农业打工、受雇、非农散工)。剔除缺失值、匹配家庭问卷和成人问卷,最终得到10395个样本。

(二) 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生活满意度。根据CFPS2018调查量表说明书,采用“生活满意度”和“未来信心程度”两个题项来衡量生活满意度,标度类型为5分制李克特量表。

2. 解释变量

(1) 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我国社会保障本质上是储蓄型社会保险和年金的结合,虽然具备储蓄收益和风险保障作用,但享受保障的前提是定期投入缴费,因而也会挤出劳动者的短期收入,这种双重影响是值得关注的,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社会保障计划的主观福利影响。

本研究认为,简单的缴费额并不是反映就业者这种社会保障“负担”的最佳指标,综合考虑缴费额与就业者经济水平更能够反映缴费给个体带来的真实负担。同时,部分工作(如主营业务存在季节性特征的工作、个体经营户、企业雇主等)的工资收入在一年内并不稳定,且可能被归为家庭收入。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采用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月缴费额与就业者家庭年收入的比率代表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反映社会保障缴费给就业者带来的经济压力。具体计算方式为:社会保险月缴费收入/家庭年收入;住房公积金月缴费收入/家庭年收入,标度类型为定比连续型变量。

(2) 工作满意度(中介变量)。采用工作满意度量表中的4个指标:工作收入满意度、工作安全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时间满意度来衡量就业者对于工作的主观评价,标度类型为5分制李克特量表。

(3) 抑郁心理(中介变量)。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中的6个指标测量抑郁情况,标度类型为4分制李克特量表。

(三) 样本构成

本研究共包含 10395 个样本。20 岁以下、21-40 岁、41-60 岁和 61 岁以上的调查对象分别占比 0.9%、30.8%、47.6%和 20.7%；工作类型主要为自家农业生产经营和受雇，分别占比 43.8%和 42.0%，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他自雇、农业打工、非农散工分别占比 11.2%、0.7%和 2.3%；家庭收入情况按四分位分组从低到高分别占比 24.4%、26.1%、25.1%、24.4%，均匀覆盖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就业者。

四、研究假设、模型与实证分析

(一) 研究假设

(1) 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与生活满意度

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体现就业者为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所承受的经济压力，已有研究表明，缴费挤占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消费能力，这种成本性支出直接降低主观福利感知（岳经纶、尤泽锋，2018）。基于此，本文提出：H1：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负向直接影响。

(2) 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社保负担率对就业者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压缩当下可支配收入的经济成本，也是象征工作正规性与未来安全的制度保障。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对于受雇群体而言，用人单位分担社保成本的行为传递组织支持信号，可增强雇员的职业保障感与制度认同（郑刚、赵月，2021）。鉴于样本中受雇群体占比显著，这种共担机制很可能提升其工作满意度。而工作满意度通过工作-家庭资源溢出效应（Sirgy et al., 2019），最终提升生活满意度。因此，工作满意度可能在二者间起中介作用。具体提出以下假设：据此构建路径：H2a：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对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H2b：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H2：工作满意度在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与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

(3) 抑郁心理的中介作用

抑郁心理表征就业者的心理健康风险。社会保障通过提供制度化“安全网”，降低未来不确定性引发的生存焦虑（刘传利等，2022）。心理健康作为情感体验的基础要素，直接制约生活满意度水平（Butts et al., 2015）。由此形成传导机制：H3a：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对抑郁心理存在显著负向影响。H3b：抑郁心理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H3：抑郁心理在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与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

(4) 工作满意度与抑郁心理的链式关系

工作满意度体现个体与职业环境的适应程度。毛畅果、郭磊（2021）的实证研究表明，职业适应良好的劳动者抑郁风险显著降低。当工作满意度提升时，就业者更易获得心理安全感，形成“职业适应-心理健康”的增益循环。故提出：H4a：工作满意度对抑郁心理存在显著负向影响。H4：工作满意度与抑郁心理构成链式中介路径。

(二) 研究模型

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通过并行机制影响生活满意度：除直接路径（H1）外，既可通过工作满意度（H2）与抑郁心理（H3）独立传导，亦可通过“工作满意度→抑郁心理”链式路径（H4）协同作用。各路径共同构成完整作用机制（图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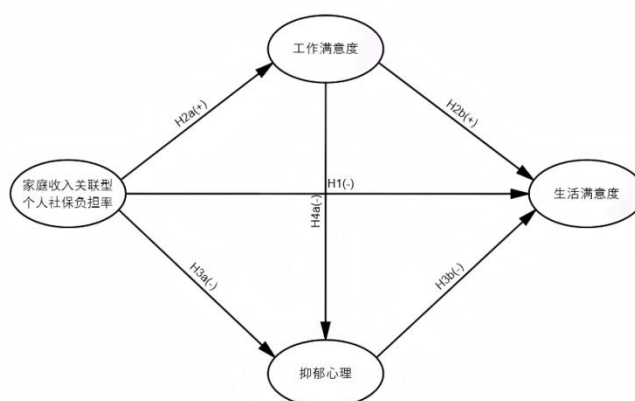


图 4-1 理论模型图

(三) 量表质量分析

为了保证量表的可靠性，研究使用 Cronbach's α 系数进行信度检验，结果达到了量表信度系数的基本要求。在对量表正式进行效度分析之前，以 KMO 值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的显著性为基准，结果显示，量表 KMO 值为 0.803，显著性水平小于 0.001，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随后对问卷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测试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 0.5。

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如下： $\chi^2/df=2.78$ ，RMSEA=0.049，CFI=0.957，NFI=0.944，表明该模型结构效度良好，拟合较为理想。对各量表进行了区分效度的检验，通过分析和计算得到各量表之间的相关性，如表 4-2 所示。

表 4-1 区分效度

	工作满意度	抑郁心理	生活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	0.684		
抑郁心理	-0.148**	0.606	
生活满意度	0.348**	-0.311**	0.709

注：对角线为 AVE 评价方差变异抽取量平方根值。

由表 4-2 可知，概念之间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p<0.05$)。另外，彼此之间又具有一定的区分度，即说明三组问卷的区分效度理想。

(四)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工作满意度和抑郁心理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拟合优度检验显示， $\chi^2/df = 5.70$ ，NFI=0.988，CFI=0.990，TLI=0.987，RMSEA=0.036，说明模型拟合较好。主要变量分析表明，加入中介变量后模型的直接路径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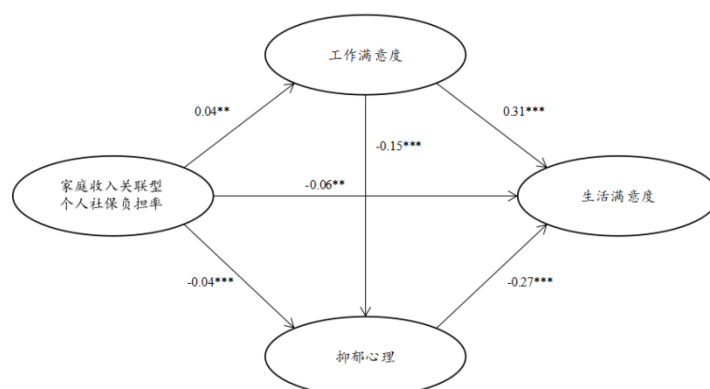


图 4-2 工作满意度和抑郁心理的链式中介效应的标准化系数结果

使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程序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重复取样 2000 次，所得中介效应与效应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假设均得到证实。

表 4-2 中介效应与效应量（标准化系数）

效应类型	路径	效应量	95% 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直接效应	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生活满意度	-0.063	-0.085	-0.039
中介效应	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	0.012	0.004	0.022
中介效应	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抑郁心理→生活满意度	0.012	0.004	0.019
中介效应	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工作满意度→抑郁心理→生活满意度	0.002	0.001	0.003
	总效应	-0.037	-0.060	-0.005

(五) 异质性分析

分析不同人群的影响机制差异有利于整体把握和丰富本研究。根据样本的特征进行分组估计,发现部分分组的估计结果与全样本路径系数和部分研究假设存在一定差异,如下所示。

1. 年龄 45 岁及以下的样本

针对年龄在 45 岁及以下的青壮年就业者样本(模型拟合指标良好: $\chi^2/df = 2.818$, $NFI = 0.985$, $CFI = 0.990$, $RMSEA = 0.020$),其路径分析结果与全样本相比呈现出若干差异。

首先,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负向效应在该群体中显著更强,且未能显著缓解抑郁心理。这一现象可能与青壮年群体更关注社保缴费对其当前可支配收入的即时挤压效应有关,因其较少或尚未充分享受到社保待遇的未来收益;同时,这也与前文观察到的该年龄段人群心理健康问题相对突出的状况相呼应。其次,社保负担率对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在青壮年组中更为显著。这或许源于该群体正处于职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对工作的正式性与保障性更为重视。较高的社保负担率在此情境下,可能被感知为更深层次的社会保障参与和工作正规性的标志,从而提升了工作满意度。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社保负担率对生活满意度的总效应在此组中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直接效应(负向)与间接效应(通过提升工作满意度的正向)方向相反且强度相近,表明模型中存在明显的竞争性中介(或称遮掩效应)。

2. 受雇于他人/他家/组织/单位/公司的样本

对受雇于组织或单位的就业者样本分析显示(模型拟合可接受: $\chi^2/df = 3.815$, $NFI=0.982$, $CFI=0.987$, $RMSEA=0.025$),其作用机制与全样本存在关键差异:社保负担率对抑郁心理和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均不显著,其影响完全通过工作满意度的中介路径间接作用于生活满意度,且总效应显著为正。

这一差异可能源于两方面原因。首先,受雇群体面临复杂的多重职场压力,其抑郁心理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王睿等,2021),社保负担率本身兼具积极与消极内涵,故难以成为抑郁的直接决定因素。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受雇就业者的社保缴费主要由雇主承担(依据现行法规,雇主缴费比例通常更高),相比灵活就业,个人实际负担明显减轻。同时,参与社保计划意味着获得来自雇主的长期储蓄性保障,提升了受保障感知。这种更强的获得感和保障感,可能有效抵消了社保缴费对短期可支配收入的潜在负面影响。既有研究也支持社会保障状况对受雇者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影响(李超、郗希,2017)。因此,对该群体而言,社保负担率并不直接损害生活满意度,而是通过显著提升工作满意度,进而间接产生积极影响。

六、研究启示

(一) 推进社保减负降费,优化制度效能

当前较高的社保费率对个体(特别是青年灵活就业者)和用人单位(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构成显著负担,抑制了可支配收入与消费能力,部分企业甚至通过违规操作转嫁成本,损害劳动者权益。降低社保费率是优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路径。此举一方面能直接缓解个体与家庭压力,释放购买力,扩大参保基数,并促进多层次保障体系中第三支柱的发展;另一方面可有效减轻企业负担,有助于稳定就业形势。因此,持续推进社保减负降费政策具有现实必要性。

(二) 强化基金可持续性与制度公平性

在实施减负降费的同时,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深带来的社保基金压力挑战。可行的配套措施包括:探索将部分国有资产(如国有企业利润)划转社保基金,用以弥补潜在缺口并体现社会反哺的公平性;加速推进社会保障全国统筹进程,缩小区域间在缴费标准与待遇水平上的差距,提升制度的整体公平性与参保者的获得感,从而缓解社保负担对生活满意度的潜在负面影响。

(三) 着力提升就业质量与工作认同感

研究表明,工作满意度作为就业者主观福利的核心维度,显著影响其心理健康与生活满意度,并在社保负担的影响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提升就业质量是增强工作认同感的关键。这要求:完善灵活就业的工时管理制度,设定符合行业特点的标准,改革不合理的计件工资制,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健全工资制度,强化集体协商与支付保障,并运用财税等再分配手段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同时扩大基本就业服务的覆盖范围;针对灵活就业者、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应着力扩大社保覆盖面,并提供更有效的税收优惠、创业贷款等政策支持。

(四) 构建职场心理健康支持体系

职场心理健康问题频发但易被忽视,对就业者福祉构成潜在威胁。为缓解社保负担等压力源对生活满意度的不利影响,亟需加强心理健康建设:构建由政府主导、社会机构与用人单位联动的心理健康帮扶机制,引入专业力量提供定期咨询与风险筛查服务;同时,有必要探索将心理咨询服务纳入医疗保障范畴,鼓励医疗机构提供面向就业群体的压力疏导服务,以降低心理健康风险、提升问题可及性并减轻经济负担。

参考文献

褚雷、邢占军:《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基于 CGSS2012 和 CGSS2017 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0 期。DOI:10.14112/j.cnki.37-1053/c.2020.10.013.

关博:《降低“五险一金”缴费率合理降低企业人工成本》,《中国经贸导刊》2016 年第 28 期。

关晶、王国军、耿春俐:《农业保险对农民务农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金融与经济》2020 年第 3 期。DOI:10.19622/j.cnki.cn36-1005/f.2020.03.012.

何泱泱、周钦:《“新农保”对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保险研究》2016 年第 3 期。DOI:10.13497/j.cnki.is.2016.03.010.

李超、郝希:《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7 年第 2 期。

李亚青、王子龙、向彦霖:《医疗保险对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财经科学》2022 年第 1 期。

李越、崔红志:《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4 年第 4 期。DOI:10.20074/j.cnki.11-3586/f.2014.04.002.

刘传利、秦文哲、徐凌忠等:《抑郁在老年人领悟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现代预防医学》2022 年第 3 期。

毛畅果、郭磊:《员工抑郁的工作与生活影响因素及应对》,《北京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2 期。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211207.

王睿、韩此林、魏航等:《二级以上医院医师抑郁状况及其职业影响因素的多水平模型》,《中国卫生统计》2021 年第 5 期。

王震、刘天琦:《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财经科学》2021 年第 4 期。

岳经纶、尤泽锋:《挤压当前还是保障未来:中低收入阶层养老保险幸福效应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郑刚、赵月：《社会保险缴费对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影响——以T公司为例》，《经济研究导刊》2021年第22期。

Butts, M. M., Becker, W. J., & Boswell, W. R. (2015). Hot buttons and time sinks: The effects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during nonwork time on emotions and work-nonwork conflic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3), 763-788. DOI:10.5465/amj.2014.0170.

Ralston, M., Schatz, E., Menken, J., Gómez-Olivé, F. X., & Tollman, S. (2019). Policy shift: South Africa's old age pensions' influence on perceived quality of life. *Journal of Aging & Social Policy*, 31(2), 138-154. DOI: 10.1080/08959420.2018.1542243.

Sirgy, M. J., Lee, D. J., Park, S., Joshanloo, M., & Kim, M. (2019). Work-family spillover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ping strategie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1(8), 2909-2929. DOI: 10.1007/s10902-019-00205-8.

Pressure or Safeguard: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Social Security Burde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Huang yi

Guangdong Peizheng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830

Abstract: Social security provides workers with both long-term anticipated protections and short-term compression of living standards.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novel concept of household income-linked individual social security burden rate and utiliz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analyze its impact mechanism on workers' life satisfac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dual effects: 1) The burden rate adversely affects life satisfaction by compressing short-term living standards, and 2) Conversely, through security benefits, it positively influences life satisfaction via a chained multiple mediation effect involving job satisfaction and reduced depressive symptoms. These insights offer new perspectives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Recognizing and leveraging this duality is particularly crucial for precarious workers facing high burdens with low security retur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reducing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s and expanding the contribution base, minimizing contribution discontinuities, optimizing social fund management through revenue expansion and expenditure control, implementing nationwide benefit pooling, enhancing job quality assurance and mental health infrastructure.

Keywords: Household Income-linked Individual Social Security Burden Rates; Job satisfaction; Depressive psychology; Life satisfaction